

# 靈知視角下的“影響的焦慮”

##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Reconsidered from a Gnostic Perspective

黃峰

HUANG Feng

### 作者簡介

黃峰，泰山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講師。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HUANG Feng, Assi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Taishan College.

Email: huangfengfp@163.com

## Abstract

A close reading of Harold Bloom's works shows that Bloom's literary criticism has clear Gnostic features. Ancient Gnostic thought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Bloomian terms, such as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strong poets" and "misreading".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two-layer meaning of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from a Gnostic perspective. Firstly, the superficial meaning of the term refers to the psychological burden that newcomers feel as a result of the objective influence of their predecessors' achievements, which negatively hinders writing. Secondly, the deeper meaning of the term refers to the Gnostic "inspiration" of all individuals, who can demonstrate their originality by constantly rebelling against the anxiety of prior symbols (i.e., misreading), and in this respect the term has a positive constructive meaning. For Chinese readers, we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potential Gnostic meaning in the ter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but also note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the deconstructive/constructive thinking it contains in expanding textual connotations and searching for the meaning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Keywords:** Harold Bloom, Gnostic,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Strong Poet, misreading

《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是美國當代文論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的重要代表作。一經出版就受到學界的普遍關注，進而引發了關於布魯姆文論觀點的持續爭議。例如，英國文論家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一方面盛讚該書表達的觀念“是過去十年最大膽的原創性文學理論之一”<sup>①</sup>，另一方面則質疑其批評觀點的客觀性和嚴謹性，“在單調的情節概括或者荒謬的長段引用之後再加上一些業餘的、不甚嚴格的評論，這使讀者感到無聊”<sup>②</sup>。美國學者羅伯特·V.楊（R.V.Young）選擇從宗教視角分析學界對該書乃至布魯姆本人的各式爭議，他認為，“從根本上說（布魯姆的批評實踐）是一種靈知式神學”<sup>③</sup>，這一點或許是布魯姆批評實踐出現爭議的關鍵根源。在面對提倡積極“誤讀”的布魯姆時，如何確保對他的理論體系有準確的了解，是我們分析乃至反思布魯姆批評觀念的起點。鑒於羅伯特·V.楊只是對布魯姆批評實踐進行基本的概述，並沒有深入到具體的文本分析中，本文擬在回應其觀點的同時，通過探索布魯姆的宗教背景，具體分析“影響的焦慮”這一布魯姆式學術標籤。

## 一、布魯姆批評實踐的靈知色彩

“靈知”一詞最初源自希臘語“gnōsis”，意為“知識”，國內學界也將其音譯為“諾斯”。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知識或常識，作為宗教術

<sup>①</sup>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6), 159.

<sup>②</sup> 特里·伊格爾頓：《異端人物》，劉超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9頁。[Terry Eagleton, *Figures of Dissent*, trans. LIU Chao et al.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2014), 189.]

<sup>③</sup> Robert V. Young, "Harold Bloom: The Critic as Gnostic," *Modern Age* 47, no.1 (2005):19-29.

語的“靈知”是指與拯救人類有關的真理性知識，自帶神秘性光環。它代表着紀元後在猶太人離散區域及西亞地區廣泛出現的複雜的宗教思想，是在特定歷史、文化及宗教背景中發展而來的。<sup>①</sup> 基督教把靈知思想視為正統信仰之外的異端，而信奉它的信徒們則認為這是一種源自個體內在的神聖啟蒙，有助於個體從現世危機中得到啟發與終極拯救。這些信徒們雖然被統稱為“靈知派”（Gnostics，也可見“Gnostic groups”的說法），但這一概念本身並不是一種特指，因為不同的信徒有不同的靈知教義，並沒有形成像基督教那樣的體制性教會。故而，所謂的靈知宗教（The Gnostic Religion）只能被視為“一個在古代世界晚期廣泛傳布的宗教運動”<sup>②</sup>，只有眾多小規模宗教團體的各自傳承，最終絕大部分都泯滅於歷史塵烟中。但不可否認的是，有關靈知的宗教思想卻在西方文化中留有明顯的痕跡，很多宗教學家、哲學家、藝術家以及文學家都與其有着潛在的緊密關聯。對於布魯姆的批評實踐而言，亦有很多線索顯示出他與靈知思想的密切關聯。

布魯姆早期的學術生涯中找不到他利用古代靈知思想進行文學批評的明確證據。在《雪萊的神話》（1959）、《幻想的陪伴》（1961）和《布萊克的啟示》（1963）等三部最早的著作中，布魯姆雖然表露出對浪漫主義詩歌某種神秘要素之獨特性和預言性的關注，卻並不意味着這是布魯姆對靈知思想的興趣或運用。<sup>③</sup> 但1970年出版的《葉芝》附錄顯示，“Gnosticism”一詞至少出現了42次。<sup>④</sup> “靈知主義”使用頻率的突然提升表明此時的布魯姆注意到了靈知思想。

---

<sup>①</sup> Kurt Rudolph, *Gnosis: 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Gnosticism* (San Francisco: Harper&Row, 1983), 277.

<sup>②</sup> 保羅·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尹大貽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第37頁。[Paul Tillich,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trans. YIN Dayi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08), 37.]

<sup>③</sup> 僅在《幻想的陪伴》中出現過一次“Gnosticism”，也只是提及該詞，並無具體論述。

<sup>④</sup> Harold Bloom, *Yea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495.

這一醒目的轉變，還可從布魯姆1966年的著作《千禧年的徵兆：關於天使、夢境和復活的靈知思想》（*Omens of Millennium: The Gnosis of Angels, Dreams, and Resurrection*）中找到明確的佐證。在書中，布魯姆自稱於1965年（35歲）陷入一場精神危機，情況危急到即使通過出國散心、精神治療等方式都不見好轉。後來讓其擺脫精神危機的原因，是“1965年拯救我的一段經歷：從閱讀開始、然後成為某種形式的信仰轉變，這同時也是深入個人文學理論之旅”<sup>①</sup>。對他產生如此大影響的書籍正是學者漢斯·約納斯（Hans Jonas）的《靈知宗教》（*The Gnostic Religion*）。這本書“影響到布魯姆對這一古代異端之說的接受”<sup>②</sup>。這種接受在本文看來，並非布魯姆對約納斯觀點的傳承，而是後者的學術活動為布魯姆打開了了解古代靈知思想的窗口，使其日後的學術實踐活動多了一層來自宗教領域的重要思想源泉。結合布魯姆在1970年之後對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愛默生（R.W. Emerson）等人的評述可見，此時的他已將古代靈知思想視為擺脫精神危機的途徑了，而《影響的焦慮》一書此時尚未面世。

在此一精神危機之後，古代靈知思想就明顯地涉入布魯姆的批評實踐中，布魯姆著作的名稱、其使用的核心術語和批評觀念等無不帶着鮮明的靈知色彩。下列表述都是十分明顯的例證：“這意味着強力詩人充分地使用靈知者的立場，而後者是西方所有主要修正主義者的前驅。”<sup>③</sup>“麥爾維爾對聖經神學的拒斥，以及對自然和歷史的近乎靈知式懷疑，可以在其《廣場故事》（*The Piazza Tales*）以及後期的小說詩歌中，找到明顯的表述。”<sup>④</sup>除了主動的宣道、大量創作上的細節呈現外，布魯姆在接受採訪時也明確地表示了對正統信仰的質疑：

<sup>①</sup> Harold Bloom, *Omens of Millennium: The Gnosis of Angels, Dreams, and Resurrection*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6), 25.

<sup>②</sup> Alistair Heys, *The Anatomy of Bloom*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1.

<sup>③</sup> Harold Bloom, *Poetics of Influence* (New Haven: Henry R. Schwab, Inc, 1988), 127.

<sup>④</sup> Harold Bloom, *Short Story Writers and Short Stories*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5), 37.

“我並沒有十分正統的宗教信仰。甚至當我很小的時候，我也對有關靈性的正統觀念保持明顯的懷疑態度。現在，我只是視正統猶太教為一種……對希伯來聖經的強烈誤讀。”<sup>①</sup> 從這些評述和採訪中，我們已可窺見在後期涉及《聖經》文本時，布魯姆批評實踐所持有的誤讀式詮釋立場了。

美國學者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在一本關於靈知主義的著作中明確指出：“布魯姆對靈知主義的運用最主要體現在他的文學評論理論著作中。”<sup>②</sup> 另一位美國學者蘇珊·韓德爾曼（Susan A. Handelman）亦認為布魯姆是一位秉承猶太異端詮釋傳統的文論家：“雖然布魯姆的學術專業確實是浪漫主義詩學，但最終不是華茲華斯而是更古老的有關不朽的暗示——靈知主義和卡巴拉詮釋體系中偉大的修正主義者——引領着他走向再生。”<sup>③</sup> 在本文看來，這種來自宗教層面的因素，正是我們探究布魯姆批評理念的起點，正如布魯姆自己所言：“如果之前有人問過我的宗教立場是甚麼的話，我一定會說‘猶太靈知主義’（Jewish Gnosticism）。”<sup>④</sup> 從這一思路出發，包括《影響的焦慮》中的同名術語“影響的焦慮”在內的布魯姆式術語，都有着不應被忽視的靈知式內涵。

不過，“靈知主義”不等同於靈知思想，這是我們探究“影響的焦慮”等術語的關鍵。本文認為，靈知思想是基於宗教層面的宗教術語，是一種關於現實危機下如何實現拯救個體（而非拯救單一民族）的啟示式教義，是猶太教“彌賽亞”觀念在異質文化背景下的被動演

<sup>①</sup> Antonio Weiss, “Harold Bloom, The Art of Criticism No.1,” *The Paris Review*, no.118 (1991): 179-232.

<sup>②</sup> 羅賓遜、史密斯等編：《靈知派經典》，楊克勤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658頁。[James M. Robison and Richard Smith et al.eds., *The Nag Hammadi Library*, trans. YANG Keqin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4), 658.]

<sup>③</sup> Susan A Handelman, *The Slayers of Mos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2), 183.

<sup>④</sup> Imre Salusinszky, *Criticism in Society* (New York and London: Methuen, 1987), 52.

釋——拯救的關鍵不在於外在先驗的神，而是基於個體內在的“認知”。但從布魯姆1970年之後的著作可見，他對古代靈知思想的運用雖然十分明顯，但略顯龐雜隨意，並沒有絕對地推崇某一靈知派，更多時候是混合式使用各類靈知思想，哪怕這些靈知思想所屬的古代教派有着教義上的矛盾衝突。

布魯姆所謂的“猶太靈知主義”，更應被視為一種源自猶太民族信仰的思維範式。而“靈知主義”更應被視為哲學術語，而非宗教術語，它有着不同於靈知思想的哲理性。對此，約納斯曾指出“混合性”是“靈知主義”的首要特徵：“靈知系統混合了一切——東方神話，占星學說，伊朗神學，猶太傳統包括聖經的、拉比的還是神秘的因素，基督教救贖論和末世論，柏拉圖主義術語和概念。在這一時期達到了最大的（混合）效果。”<sup>①</sup>庫里亞諾（Ioan P. Couliano）在認可這一觀點的同時，還指出“革命性”是“靈知主義”的另一核心特徵：“如果它（靈知派）被看作相對統一的現象，那是出於它的基本態度。就其與當時最重要的學說和宗教間的關係來說，這種態度是革命性的。”<sup>②</sup>本文認為，布魯姆所秉承的“猶太靈知主義”正是這樣一種思維範式：它採取最主要的革命性作為邏輯維度，包容着有關“靈知”的各式教義，在表面的大混合之下，其深層意涵則為對現實處境的否定以及自我認知上的求新求變。這種具有明顯哲理性的思維範式，應是我們詮釋“影響的焦慮”的關鍵維度。

## 二、作為“影響”的靈知式“靈感”

遵循一般邏輯，“影響”是依照時間順序發生的物理事件。由於

<sup>①</sup> Hans Jonas, *The Gnostic Religion*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25.

<sup>②</sup> 約安·P·庫里亞諾：《西方二元靈知論》，張湛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頁。[Ioan P. Couliano, *Les Gnozes Dualistes d'Occident*, trans. ZHANG Zhan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2.]

新人處在時間軸的後端，必然面臨前人“慷慨”的“給予”。傳統影響觀認為這種單向輸入的“影響”，是新人可以利用的財富。布魯姆則認為這樣的“影響”只是一種流入式的“給予”，如同星光一樣，從一個星星投射到另一個星星上，後者只有被動接受的可能。因此，布魯姆強調，他提出“影響的焦慮”這一術語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指出“我們曾認為的一位詩人幫助另一位詩人成長的說法是多麼的不可靠”<sup>①</sup>。流入式“影響”不是正面的、有利於新人成長的積極因素，反而是阻礙、約束新人發揮創造性的消極因素，這是前人對新人的單向性輸入。在詩歌漫長的發展史中，並不是所有的詩人都會成為優秀的詩人。大量資質一般的詩人只能匍匐在前人的影響之下，走在低級模仿的路上，超越也就無從談起。此時，這種模仿對於新人而言，沒有起到真正意義上的促進作用，反而是一種桎梏，一種沉重的精神負擔。就好比欠了債務一樣，導致新人創作上缺乏原創性。可見，布魯姆並沒有將一般邏輯上的“影響”視為新人的福利，而是將其視為約束、壓迫新人的行為。

但如果只是在單向輸入這個層面上理解布魯姆的“影響”，甚至“影響的焦慮”，那就忽視了上述所提及的靈知背景。這裏對“影響”單向性輸入的分析，只是指出布魯姆注意到傳統影響觀存在着被人忽視的偏失或負面作用。本文認為，這種偏失應被視為一種普遍性的文學現象，不能算作一種文學理論，更不能視為布魯姆在理論上的新見解，充其量只能視之為他特別強調的地方。相反，布魯姆對“影響”一詞有着自己獨特的看法：他（自認為）發掘出了“影響”一詞的潛在寓意，並以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第87首的“閱讀體驗”為例指出，“影響”一詞具有雙重含義。表層含義是“流入”，這是常見的含義，是一種單向性輸入行為，是一種動態的歷時性呈現；深層含義則是“靈感”（inspiration）<sup>②</sup>的代指，布魯姆在2011年出版的《影響的剖析》（*The*

---

<sup>①</sup>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5.

<sup>②</sup> *Ibid.*, xii.



*Anatomy of Influence: Literature as A Way of Life*) 一書中，再度如此表述。<sup>①</sup> 相比表層含義，“靈感”是布魯姆所認為的個體（包括作者）最神秘的內在天賦。對於作家而言，他們要想在文學史中贏得一席之地，就必須呈現出源自自我的“靈感”。兩相比較，前一層含義對於文學創作的開展，有着消極的壓抑作用，而後一層含義則體現了對作家創作主動性、原創性的重視，有着積極的建構作用。

不可否認，這種寓意詮釋具有鮮明的布魯姆特色。畢竟他這種獨特的閱讀體驗及詮釋結果不是隨意的偶然行為，而是刻意為之的個性化批評行為。通觀第87首十四行詩，莎士比亞用“the riches”“fair gift”或“great gift”等詞語表示某種潛在的好屬性，誰要獲得或被給予這一屬性都將是美好的事情。但莎士比亞並沒有提及這一屬性究竟為何物，也完全沒有提及“inspiration”或和其相關的詞語。可見，布魯姆的寓意詮釋本身，就是在用自己的想法偏離、篡改莎士比亞的詩句，通過個性化詮釋給文本增添新的含義。這種詮釋行為為本身，亦可理解成布魯姆運用自己的“靈感”，突破莎士比亞詩歌字面義的約束，從而達到革新原有含義、言說自我的目的。

再進一步分析，布魯姆所謂的“靈感”不同於一般文藝學意義上的創作靈感，而是一種先驗存在的稟賦。在集古代靈知思想之大成的瓦倫廷派（Valentinism）看來，最高的神性本體是一切的起源，被尊稱為“先父”或“深淵”，由他流溢出其他移湧（Aeon），並構成原初的普累若麻（Pleroma）狀態。但低級移湧身處父中，卻不了解父，這種不自知的狀態導致了普累若麻的動蕩，並誕生出低級造物主德牧革（Demiurge）、宇宙萬物及人類。瓦倫廷教義思想的核心在於強調，為了使普累若麻恢復至原初的平靜狀態，神性本體通過將自身的神性因子（或稱“碎片”，“普紐瑪”[pneuma]等）植入人類體內，寄希望於每個個體能夠衝破物質世界的囚禁，完成復歸原初的神聖使

<sup>①</sup> Harold Bloom, *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Literature as A Way of Lif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2.

命。簡言之，即通過個體尋覓內在潛藏的神性因子，達到復歸的拯救目的。本文認為，布魯姆正是從這一靈知思想出發，將“影響”寓意詮釋為“靈感”，賦予其神秘性、先驗性、共時性、交互性的特點。此時，作為“靈感”的“影響”不再是單向性的輸入行為，而是所有個體都具有的內在稟賦，只不過它對於絕大部分人而言一直處在被遮蔽的狀態中。

如此一來，布魯姆在強調“影響”具有“流入”含義的同時，也建構出靈知式“靈感”之義。一方面，文壇新人需要對前人的流入式“影響”進行抗衡，唯有如此才能在文壇上擁有一席之地。但新人在時間上的遲來性，決定着他們必然面對已成定局的創作現狀，已有文學成就必然限制着新人的創作。另一方面，基於對神性因子的共同持有，個體內在的“靈感”雖然具有不可絕對呈現的神秘特點，但所有個體都需要肩負起不斷認知內在“靈感”的責任。由此，“影響”就在布魯姆的反轉式詮釋中，具有了積極的指向，作家們要想有所作為，就需從被動地接受“流入”轉向主動地尋覓“靈感”。如果新人能更好地尋覓“靈感”，那麼前人向新人學習這個奇怪的觀點自然也就成了布魯姆的結論之一。

### 三、作為尋覓行為的“焦慮”

在弗洛伊德看來，焦慮是個體特定的情感狀態，是對“快樂—痛苦情感系列中的某些情感的混合”，<sup>①</sup> 所以它既有可能來自於本我突顯的壓力，形成神經性焦慮，也有可能來自超我嚴格約束時的壓力，形成現實性焦慮。<sup>②</sup> 通觀布魯姆的批評實踐，可以看出布魯姆反對從

---

<sup>①</sup> 車文博主編：《精神分析新論》，汪鳳炎等譯，長春：長春出版社，2004年，第51頁。[CHE Wenbo, ed., *The Selected Works of Sigmund Freud*, trans. WANG Fengyan et al. (Changchun: Changchun Press, 2004), 51.]

<sup>②</sup> 同上，第49頁。

純心理學角度探究焦慮，更反對只從外界入手去尋找個體焦慮的緣由。在布魯姆看來，前者是偽理性主義的代表，而後者則是典型的本末倒置。“焦慮”之於布魯姆，正如他對“影響”的詮釋一樣，同樣有着雙層含義。雖然在對“焦慮”的劃分形式上，布魯姆確實類似於弗洛伊德的做法，但由此認定布魯姆的批評方法是“精神批評式（psychocritical）方法”<sup>①</sup>並不合適，他並不是弗洛伊德派的合格弟子，對力比多（libido）之說沒有絲毫的認同感。

首先，從表層含義來看，“焦慮”是外在影響的產物，是個體的一種心理狀態。新人在面對前人已有成就時，會因處在歷時性的被動影響下，而對自身的遲來性以及創作上的受約束狀態產生焦慮的心理。這種由外在“流入”式影響而來的焦慮感，究其本質根源在於時間的單向性流動，所有個體面對前人都必然背負着身為遲來者的原罪身份，被動接受影響也就成了無法擺脫，也無法克服的創作窘境。布魯姆將這層含義的焦慮感，視為新人面對前人過分強大的影響而無法擺脫時的心理狀態，一種對前人早早擁有文字表述權力的無助心態。正如他分析A.R.阿蒙斯（A.R. Ammons）和約翰·阿什貝利（John Ashberry）等詩人的創作時，就曾如此論道：“從中我能注意到一種對抗詩歌衰亡的力量，雖然它也透露出遲來者的艱辛倦怠。”<sup>②</sup>

很明顯，這層含義下的焦慮只是歷時性的時間產物，一種心理症結，對應的是“流入”式影響。畢竟新人不可能改變自己的出現時間，跳至前人的前面爭奪表述的權力，所以新人的焦慮心態既是普遍存在的，也是無法克服的。故而，作家越是迫切地表明自己與前人沒有關係，反而越是證明他潛在地承受着因前人巨大影響而帶來的焦慮心理。從布魯姆的批評實踐中，我們可以找到很多這方面的例子，甚至布魯姆本人就是很好的範例。20世紀中葉的新批評派對浪漫主義文

<sup>①</sup> Raman Selden,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Edinburgh: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5), 175.

<sup>②</sup>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12.

學的貶低，以及對形式主義研究方法的推崇，是布魯姆早期研究生涯所面對的學院派批評，作為新人的他不可能忽視這種批評觀的存在，就好比古代靈知者無法忽視正統猶太教信仰的存在一樣。因此，當布魯姆越是激烈地反駁T. S.艾略特（T.S.Eliot）等批評界前輩時，越是凸顯了他對抗式批評的背後深受前人影響的心態：無法驅散的焦慮感——一種批評界遲來者的無奈心理，一種怎麼都不願接受前人影響的防禦性心理。

從古代靈知思想來看，瓦倫廷派堅信個體處在與絕對的神性本體的暫時性分離中，這種分離導致所有個體都處在靈知式異化中，是人類深陷生存困境的真正根源。故而，在瓦倫廷派看來，只有當神性本體的碎片（也即內在的“靈感”）被尋覓到或重新予以呈現時，原初的普累若麻狀態才能得以恢復。布魯姆將這種教義思想所蘊含的思辨邏輯嫁接到文學批評領域，認為作家不應糾結於自己作為新人所背負的遲來性，而是應該採取尋覓“靈感”的自主言說行為，以此達到擺脫外界及前人影響的認知目的。此時，“焦慮”就不再是一種心態，而是個體基於自我的自主言說，即尋找內在靈感的認知行為。很明顯，“焦慮”的深層含義——布魯姆所特別在意的靈知式含義——不是一種備受壓抑的弗洛伊德式病症，而是一種自主言說的尋覓行為，類似古代靈知者的自我認知、自我神化、自我拯救之行徑。“焦慮”不再是名詞，而是動詞，<sup>①</sup>是個體渴望治愈自我與神性本體分離的認知行為，它要克服的第一個目標恰是自身的表層含義。

將個體被動的靜止心態，反轉為具有主動性的持續行為，這種詮釋的關鍵就在於布魯姆對文學實踐中個體地位的重新肯定。相對於當時居於學術界主流的形式主義批評對文本本身的固執，文本的生產者反而被不斷地邊緣化，逐漸成為工具性的中介。布魯姆反對對個體的

---

<sup>①</sup> 楊慧林：《意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頁。[YANG Huilin, *Mean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4.]

簡約化處理，其用意或許正是在於強調文學之於個體，個體之於“存在”的意義。“存在”或意義都不是絕對的超然範疇，它們需要藉由個體加以展現，哪怕只是一種相對的展現。因此，布魯姆對“焦慮”進行靈知化詮釋，乃是對個體認知能力或主體性的肯定，真正的“焦慮”不應是被動的結果，更不應只是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在因素的流入式影響，而應是個體獲取認知、逼近意義的主動性行為。由此而論，我們要清楚地認識到，在布魯姆的批評邏輯中，重要的不是影響導致了個體的焦慮，而是個體的焦慮性行為促進了“影響”/“靈感”的呈現。帶有貶義色彩的“影響的焦慮”，只有在靈知視角下，才能具有促進文學實踐的積極意義。

簡言之，布魯姆的“焦慮”觀亦有雙重含義：一是外界約束個體成長的心理結果，具有名詞詞性；二是個體不斷尋覓內在“靈感”的共時性行為，具有動詞詞性。很明顯，對於布魯姆而言，他更在乎的是個體內在先驗的“靈感”，而非關注純心理因素或外界的“社會力量”，文學史不是歷時的影響史或心理史，而是共時的焦慮史。那些被他推崇的經典作家們，正是他所認為的能夠充分自主言說的焦慮型作家。在本文看來，布魯姆對“焦慮”的靈知式解讀，其意義不在於略顯霸道的賞析式結論，而在於他對個體之主體性、原創性的重新肯定，他將在形式主義批評大潮中被邊緣化的個體重新納入文學批評的中心位置。

#### 四、“強力詩人”對意義的“解—建構”行為

上帝“之後”再無創世，這其中最關鍵的不是創世的結果，而是誰“先”創世，畢竟最先創世的個體擁有最不受限的權力，在其之後的個體則要面對已成定局的創世結果。這一邏輯在文學創作上同樣存在，傳統的“影響”觀不僅意味着前人對新人有着消極的阻礙作用，更意味着前人擁有創作上的“優先權”。所謂的“優先權”是指前人

處在創作順序的前端，有着先入為主的話語權，決定着創作產物的具體形態，這無疑成為後世新人不得不面對的創作範式。

布魯姆對這種憑借時間而擁有的優先權，持絕對的反對態度，“構成本書（《影響的焦慮》）的一切內容……均聚焦於創造性思維因對‘優先’強調而來的憂鬱困惑。”<sup>①</sup> 這種憂鬱的困惑是文學實踐中的新人力圖有所作為，卻又備受各種規範、經典約束時的必然感受。從這一點看，靈知視角下的“影響的焦慮”，其着力點不在於強調心理層面的焦慮感受，而在於強調個體需要採取主動性言說行為，來消解前人的“優先權”，並贏得屬於自己的創作成就。

不過，一般意義上的普通作家無法擺脫焦慮心態，只能被動地沉溺於已有影響中。畢竟不是所有個體都能像布魯姆那樣將“影響”詮釋為“靈感”，然後通過對抗或偏離來消解前人的“優先權”與自我的遲來性。能以布魯姆所推崇的焦慮性行為進行文學實踐的個體，只能是極少數的傑出人物。對於這些勢必要在文學史中獲得一席之地的偉大個體，布魯姆稱之為“強力詩人”（strong poet），與其相對應的範疇則是其口中的“弱勢詩人”（weak poet）。<sup>②</sup> 相應地，“影響的焦慮”對於普通作家而言，只是一種被動的壓抑處境；但它卻是“強力詩人”必備的技能，這是一種充滿活力的對抗性能力，一種消解前人“優先權”的顛覆性行為。

僅從信仰層面看，這種區分強者、弱者的思路並非布魯姆的首創。《新約》就曾對哥林多信眾進行“強壯的”與“軟弱的”區分，“強壯的”信徒是所謂的“完全者”，堅信自己擁有關於上界的最高智慧，而“軟弱的”信徒則是不屬靈的，並不知曉最高奧秘。這種區分為我們理解布魯姆的“強力詩人”提供了很好的參照，畢竟他在論及此概念時，背後的宗教因素同樣不可忽視。但布魯姆只算是靈知主

---

<sup>①</sup>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13.

<sup>②</sup> Harold Bloom,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6.

義式批評家，而非古代靈知思想的純粹信徒，“強力詩人”也不屬於純粹的靈知信仰者。布魯姆只是受到靈知思想的啟發，用該術語專指文學實踐中那些能夠面對前人採取不斷革新之行徑、能夠不斷自主言說的個體。

此外，在本文看來，該術語更重要的一面在於它並不限於作家群體，還包括文學實踐中的其他主體，比如“強力讀者”和“強力批評家”。強力詩人“就是以頑強的毅力始終與成就斐然的前輩們進行對抗的主角們”。<sup>①</sup>這一經典表述同樣適用於讀者與批評家，換言之，在布魯姆看來，文學實踐中的所有新人都具有遲來性身份，都面臨着文學史已成定局的事實性影響，面臨着如何呈現自己原創性思想的需求；如果不採取焦慮性行為，所有個體都會“人云亦云”，淪為時間軸上的“弱勢群體”。

對於作為文學批評家的布魯姆而言，他的批評實踐始終立足於文學領域，而非純粹的信仰領域。因此，“強力詩人”對抗前人優先權、消解自身遲來性的焦慮性行為，以及對“靈感”的尋覓，最終是落實在對已有文字符號的陌生化處理上，而非落實在與前人的信仰之爭上。被付諸筆端的文字符號，具有物質化、可視化的特點，它在展示個體思想的同時，也因具有表義的優先性，反而約束、禁錮着對意義的後續表述。此時的文字符號如同古代靈知派教義中的物質世界一樣，具有“呈現兼遮蔽”的特性，它既代表着個體的部分認知，又無法代表個體的全部認知，即所有文本的文字符號只是對個體內在“靈感”的暫時性呈現。

從這點上看，布魯姆對文學史對抗性關係的強調，本質上是強調個體與文字符號之間的對抗。“強力詩人”採取的焦慮性行為，乃是不斷地對抗、偏離文字符號，以便重新進行表義的行為，只有這樣才可能抵近被遮蔽的終極意義。因此，當布魯姆聲稱“詩歌是對其他詩

---

<sup>①</sup>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15.

歌的回應”<sup>①</sup>時，我們不應將此視為對文本間性的強調，而應將其視為對主體間性的強調，即所有個體都有着呈現先驗的“靈感”的共通性，都需要對已經化入紙面的文字符號進行陌生化處理。對於作家而言，其結果就是新詩歌的誕生，對於批評家及讀者而言，結果則是新批評觀點、新閱讀體驗的誕生。

雖然布魯姆本人並不使用“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這樣的字眼，但貫穿“影響的焦慮”批評觀的正是陌生化策略，只不過他改用“誤讀”（misprison）一詞進行使用。“誤讀”具有對文字符號的祛魅或解碼功能，是一種陌生化已有文字符號的能力，一種通過“誤讀早期詩歌”<sup>②</sup>來不斷拓展文本內涵的能力。很明顯，這種“誤讀”就是“強力詩人”採取的焦慮性行為。其實，不論布魯姆取名為“誤讀”“影響的焦慮”，抑或是所謂的六種修正方式（revisionary ratios），它們的性質都是一樣的，都是個體用以對抗已有符號、並再度表義的方式。只有“強力詩人”才能擺脫文字符號表面含義的困擾，才能“充分地理解預言與暗示、‘說話’和‘意義’之間的關係”<sup>③</sup>，最終找到走出“語言牢房”的辦法。

如此而論，“強力詩人”之強力，正是體現在他們同時具有了“解—建構”意義的能力。“強力詩人”能夠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被符號囚禁的真正意義，通過解構的方式加以祛蔽，同時，通過對已有符號的陌生化處理，再度建構起關於意義的全新表述。這種“解—建構”行為，在本文看來，正是布魯姆所秉承的靈知主義思維範式的投射，在反抗、擺脫或超越前人表義行為的同時，還在積極呈現着獨屬於自己的新認知。換言之，“影響的焦慮”以及“誤讀”是一種源自古代靈知思想的詮釋策略，兼具“消解”意義與“激發”意

<sup>①</sup>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99.

<sup>②</sup> Robert Scholes, “Reviewed Work(s):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by Harold Bloom,” *The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 73, no.2 (1974): 266-268.

<sup>③</sup> Harold Bloom, *A Map of Misreadi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69.



義的雙重邏輯，可以為具體的文本創作、文本閱讀以及文本批評，打開強力個體能夠積極參與的方便之門。

## 結語

雖然“影響的焦慮”這一術語有着明確的雙重含義，但我們對此還需要保持必要的審視態度：畢竟該術語的出發點——布魯姆個性化的閱讀體驗——並不是所有讀者或批評家的共同體驗。也不是所有人在閱讀莎士比亞詩歌時，都會將“影響”寓意解讀為靈知式“靈感”。相反，布魯姆過度的“假設”“虛構”“寓意解讀”等行為，會導致嚴謹的文學批評變成隨性的文學創作。因此，“影響的焦慮”本身並不是一種可以合理化、普遍化加以應用的詮釋範式，只能將其視為一種在古代靈知思想影響下的個性化批評觀。

但僅就當下國內外的研究現狀來看，布魯姆批評實踐背後的宗教背景確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我們不僅需要從文學和宗教的交叉領域重新探究包括“影響的焦慮”在內的布式批評觀；還要注意到“影響的焦慮”這一術語真正的詮釋學意義：它為個體勾勒出一個積極參與文學實踐的“靈知式公式”（a Gnostic formulation）<sup>①</sup>，這是有利於新人突破已有的思維定勢與意義壁壘，從而拓展個體認知的“文學信仰”之道。只有當所有個體（包括作者、讀者、批評家在內），都能夠對文字符號進行不斷的陌生化誤讀，才能真正推動文學實踐（創作、閱讀以及批評）的發展，才能真正獲得文學本身所給予的意義。

---

<sup>①</sup> Alistair Heys, *The Anatomy of Bloom*, 2.

##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loom, Harold.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_\_\_\_\_. *Poetics of Influence*. New Haven: Henry R. Schwab, Inc, 1988.
- \_\_\_\_\_. *Short Story Writers and Short Stories*.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5.
- \_\_\_\_\_. *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Literature as A Way of Lif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_\_\_\_\_. *A Map of Misreadi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Eagleton, Terry.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6.
- Handelman, Susan A. *The Slayers of Mos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2.
- Heys, Alistair. *The Anatomy of Bloom*.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 Jonas, Hans. *The Gnostic Religion*.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 Rudolph, Kurt. *Gnosis: 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Gnosticism*.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3.
- Salusinszky, Imre. *Criticism in Society*. New York and London: Methuen, 1987.
- Scholes, Robert. "Reviewed Work(s):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by Harold Bloom." *The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 73, no.2 (1974): 266-268.
- Selden, Raman.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Edinburgh: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5.
- Weiss, Antonio. "Harold Bloom, The Art of Criticism No.1." *The Paris Review*, no. 118 (1991): 179-232.
- Young, Robert.V. "Harold Bloom: The Critic as Gnostic." *Modern Age* 47, no.1 (2005):19-29.

###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車文博主編：《精神分析新論》，汪鳳炎等譯，長春：長春出版社，2004年。  
[CHE Wenbo, ed. *The Selected Works of Sigmund Freud*. Translated by WANG Fengyan et al. Changchun: Changchun Press, 2004.]

- 約安·P.庫里亞諾：《西方二元靈知論》，張湛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Coulino, Ioan P. *Les Gnozes Dualistes d'Occident*. Translated by ZHANG Zhan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特里·伊格爾頓：《異端人物》，劉超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Eagleton, Terry. *Figures of Dissent*. Translated by LIU Chao et al.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2014.]
- 羅賓遜、史密斯主編：《靈知派經典》，楊克勤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Robison, James M. and Richard Smith, eds. *The Nag Hammadi Library*. Translated by YANG Keqin.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4.]
- 保羅·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尹大貽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Tillich, Paul.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Translated by YIN Dayi.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08.]
- 楊慧林：《意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YANG Huilin. *Mean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